

1931

1931—1945年 | 14年国破家亡 | 14年烽火连城 | 恢复民族的完整记忆 | 再现国家的全面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史

第一卷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1931.9—1937.6）

张宪文 庞绍堂 等著

海外卷

1945



化学工业出版社

1931

中国抗日战争史

第一卷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1931.9—1937.6）

张宪文 庞绍堂 等著

194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1931年9月—1937年6月) / 张宪文等著.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122-29591-0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抗日战争史—中国—1931~1937 IV. ①K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4363 号

责任编辑: 王冬军 王占景

特约编辑: 范国平

责任校对: 程晓彤

装帧设计: 水玉银文化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½ 字数: 240 千字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科研项目成果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修订工作

张宪文 教授 发起并主持修订工作。修订事项包括对原书结构的调整、错漏的纠正、新内容的增加以及全书的通稿。在修订过程中，李继锋教授予以协助。

庞绍堂 教授 负责修订 第一编

李继锋 教授 负责修订 第二编

左川章 教授 负责修订 第三编

陈谦平 教授 负责修订 第四编

本书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约 26 万字的内容。

涉及中国海空军作战、苏联援华、美国空军援华、驼峰航线、苏联出兵东北等内容，由庞绍堂教授修订撰写。

涉及华北走私、绥远抗战、国防联席会议、征兵制度等内容，由李继锋教授修订撰写。

涉及国民政府的敌后游击战，由左川章教授修订撰写。

涉及滇缅反攻、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雅尔塔会议等内容，由陈谦平教授修订撰写。

本书参考书目和历史图片由李继锋教授搜集提供。

张宪文

首版为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首版编委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主编 陈谦平 陈红民

撰 著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用章 申晓云 冯 冶

朱宝琴 李继锋 吴伟荣

张宪文 张益民 陈红民

陈谦平 武 菁 庞绍堂

张宪文

(一)

1986年，国家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在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重点研究项目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战争研究”课题，可是没有人申请。规划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宗一研究员在南京开会时，动员我认领这个题目，我答应了。他说，可以资助您5万元经费。我说，太多了，写一本书哪里需要这么多钱，三四万元就够了，否则朋友会笑话的。因为那个年代，还是“万元户”时代，5万元就等于5个万元户。最后，国家规划办批准了3.5万元经费。这笔钱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帮助很大。由于这是一个大型项目，一个人在短期内无力完成，因而我组织了由年轻学者参与的学术团队，开始改变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庶几已经定型的观念，运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思想，在课题中多方面反映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共同抗战的历程，于1991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延到2001年才由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该书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2001~200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虽然该书完稿至今已经20余年，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指导思想、史料运用、学术观点，都是比较科学的，真实地反映了全面抗战的历程。以今天的认识来观察，仍然不失为一部严谨的、尊重历史的学术著作。

（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回顾抗战研究历程，总结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抗战研究的进步和发展。抗日战争研究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下的抗战研究，时间大约自1949年至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前。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政党团体团结抗敌的结果。战争胜利后的主题是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建设新中国。可是，国共两党在建什么国、如何建国、能否建成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以致很快由政治分歧而矛盾激化，再次转入内战。

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对待国共两党曾经团结抗日的认识上，产生了极为对立的观点。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趁抗战抢占地盘，发展自己的力量；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施不抵抗主义和片面抗战路线，丢失大片国土；国民党发表何应钦撰写的小册子《谁领导了抗战？》和《八年抗战之经过》以及蒋纬国编著的《抗日御侮》，绝口不提共产党的抗日。虽然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进行了上千次的大型战斗，而国民党只谈正面战场；共产党则强调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强调“人民战争”，强调全面抗战路线和敌后战场的主体作用。

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战争认识的严重分歧，对两岸学术界和人们的观念产生了

极为消极的影响。这一时期，台湾方面，学者们编辑出版了一批专题研究著作，如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梁敬錞著《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和《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等，影响最大的有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 1973 年版），但是也主要论述正面战场。大陆方面，自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国共两党的军事档案，均未开放。这一时期，有一些口述史料出版，如专讲中共军事斗争的《星火燎原》系列，以及涉及国民政府军事活动的“政协文史资料”，还有一些讲述抗日根据地的小册子等。历史教材中，基本上没有正面战场，顶多有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以后的许多重大战役，虽然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国民党官兵浴血抗敌、英勇牺牲的爱国精神，还是值得纪念的。这方面的内容在教材中销声匿迹。学生们对正面战场的历史认识，大多只知道有个豫湘桂大溃退，一溃千里。实际上豫、湘、桂是三个省，哪有三个省的大战役，它仅仅是连续作战而已。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地位突出起来。青年一代，只知道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影视片对他们的影响甚大，如《平原游击队》《鸡毛信》等。

从 1950 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研究抗日战争的论著极少。1961 年出版的李新等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 1956 年高等教育部提出的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材，由一批著名学者合著，其内容较何干之、胡华编的两部中国革命史有较大进步，但实际上其学术体系，包括第三卷抗日战争内容，仍然是中国革命史思路和框架，却被批评为“国民党家谱”。“文革”之后，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稿》，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两位教授合著，其内容仍然无法摆脱传统史学体系和观点。当时，中国学术界专门研究抗日战争的学者寥若晨星。虽然曾经生活在抗日战争年代或参加过抗日斗争的人很多，但他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却是片面的或模糊不清的。

第二阶段，是初步开放阶段，时间自 1985 年至 2005 年。198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这一阶段是对抗日战争认识的转折点，不仅研究者逐渐多起来，

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有了很大进步。

转折点的重要推动者是胡乔木。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历史陈列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1984年，胡乔木指示军事博物馆抗战馆的历史陈列，不能只反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活动，而应将国民党抗战和正面战场内容加进去，以全面反映国共两党共同进行了抗日战争。同时，还建议在卢沟桥畔宛平城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共中央批准了胡乔木的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制定了抗日战争馆的陈列改革方案。作者也有幸参与了这一方案的讨论。该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大陆的抗日战争研究，特别是对国民党和正面战场的研究。

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布了一个文件，其中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人华侨，共同进行的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文件同时指出，为抗日战争殉国而献出生命的国民党官兵，都值得我们纪念。

胡乔木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这一文件精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发展，体现了由“人民战争观”向“民族战争观”的转变，对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在北京和全国若干主要省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各地研讨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谁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说共产党领导，一说国民党或国民政府领导，一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不一而足。作者在江苏省纪念抗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上，就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学术报告。事后得知在讨论时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与会者不赞成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怎么能说国民党还抗战呢？这反映出1984年至1986年是处在抗日战争认识的转折时期，其中包括对两党、两军、两个战场地位作用的认识问题。

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

外交特别是国民党军政人物的评述和判断。如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长期以来被陈伯达等戴上了几顶大帽子：“人民公敌”“国贼”“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投机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总代表”等。也是在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后，对蒋介石才慢慢地给予了客观的真实评价，若干不恰当的帽子才慢慢地摘掉。

大约在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国民政府为什么能够在西南大后方坚持抗战八年，它的经济战略如何？希望学者们研究。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成都西南财经大学。该校的教授们曾到南京搜集史料，编著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研究》。

在这一转折时期，1984年作者与陈谦平利用原始军事档案，写出了《简论台儿庄战役》的论文，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第一篇反映正面战场的文章。同时，我们也开始编写大陆第一部全面反映正面战场各次重大战役的专著《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自1985年至1995年的十年间，在中国内地，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何理著《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三卷本的《抗日战争史》以及刘大年主编的《民族复兴的枢纽》等。作者主编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也于20世纪80年代末写出了初稿。这一时期，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汪伪和伪满史、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敌后财政经济史和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均成就斐然，成果发表和出版很多，并在学术观点上有了很大改进，认识更加实事求是。档案史料的开放使用和编纂，都有很大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文献材料，也陆续编辑出版。1995年9月，在台北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大陆有31位学者出席。研讨会体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是两岸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第三阶段，是思想全面开放，抗日战争研究走向繁荣的阶段。时间自2005年至今。

这一时间，各地开展了日军暴行史的调查研究。19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

学院成立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日军侵华罪行史的研究，先后设立了近百个课题组织调查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推动了日军细菌战研究、强掳劳工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慰安妇”研究等。2000年初，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抗战损失的调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2005年9月，中国共产党再次举行盛大集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肯定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作用。这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开展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2014年，在研究日本侵华和纪念抗日战争的相关活动中，有两件事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是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首次国家公祭仪式，这对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追思遇难同胞、捍卫人类正义、维护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二是北京国家档案馆公布了在抗战中殉国的烈士名单，不仅有共产党人，也包括国民党官兵将领。这一做法体现了抗日战争是保卫祖国的民族战争，为国家民族付出生命的国共两党的烈士，都值得我们纪念。

2015年，适逢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和俄罗斯联合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中国许多省市也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或学术研讨会。同时，学术界也推出了一大批有关抗战史的著作。台湾学者出版了6卷本、约200多万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步平等主编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大型丛书21卷。为揭露日本侵华历史罪行，我们联合各地高校、档案馆、抗战纪念馆的学者，编纂了《日本侵华图志》25卷。该书收入日本侵华罪行照片达25000张，全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的历史罪行。这种图文并茂历史图书的编纂出版，显示我国史学工作者对历史载体认识的转变。此外，前述由作者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也将在修订后于2016—2017年先后以精装版和平装版再版。

(三)

抗日战争的研究，从战后至今已有七十年的历史。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和海峡两岸政治形势的起伏，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和复杂的历程，终于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制约，逐步走向繁荣。研究成果反映出学者们的观念更加趋向于实事求是，在众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两岸历史学者基本达成一致。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观察，军事史、战争史、抗战经济史、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较深入、广泛。但是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尚待拓展研究和深入探讨。

第一，关于如何看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所谓“不抵抗主义”问题。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把它公开视为国策，对此应该如何判断和认识。我们认为，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蒋介石政府认为在战争中只有后方安定了，才能集中力量对付敌人。问题是蒋介石“安内”指的对象是谁和如何“安内”。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蒋介石是采取消灭异己力量的办法，达到安内的目的。这个异己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与蒋介石持不同政见、立场的国民党内外的军政势力。在日本强敌面前，蒋介石不是调整自己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敌，而是企图消灭异己力量，单枪匹马地去应对日本的侵略，这从政治战略上说显然是错误的，也是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

在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蒋介石在军事战略、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调整。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达了坚决抗战的决心，也受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赞扬。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显示了蒋介石在与中共团结抗战方面，向前跨出一大步。对国民政府控制下不同的军事政治力

量，在抗战的旗帜下，也表现了合作的态度，如川军、桂军等军事力量，都走上了抗战的第一线。这些都体现了蒋介石政治战略的变化和进步。

在军事战略方面，1937年8月，南京的国防会议提出了“全面抗战”和“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所谓“持久消耗战”即“以空间换时间”和“积小胜为大胜”。这一方针与中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向国民党军委会提出的持久作战原则以及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国民党的方针虽然提出的时间较早，但是共产党的方针较完整、全面、科学。

蒋介石的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其本质仍是消极防御的方针，是与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远远达不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和保卫国土的目的。

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思想虽然是保守的、消极防御性的，但是总体上说，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他逐步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对蒋介石所谓“不抵抗主义”问题，应如何认识？蒋介石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在不同阶段表现了不同的对日政策和不同的战略、策略。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阶段，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妥协、退让，谋求通过谈判以求解决冲突的方针，从而未进行真正的抵抗准备。过去，我们一直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甚至上升为“不抵抗主义”，而且从战争行动上也给人以不抵抗的判断。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和其他部队实施不抵抗的文件。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丢失了东北大片国土，蒋介石因此受到国人的普遍批评、谴责、抗议，他是无法辩解的。

研究蒋介石的不抵抗问题，首先应该观察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当时，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这种对比形势的改变，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军事上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不讲求军事策略，调动力量与敌人进行拼死斗争；一是不作任何准备，在敌人面前不作任何抵抗；一是实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妥协政策，实施以达到消灭敌人

为目标的战略性撤退，在运动转移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所应采取的正确战略方针，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这种战略性的撤退。

1931~1933年间，国民政府军事机关虽然也制定了一些作战方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仅仅是书面上的构想，并未实施和部署。在整个东三省作战期间，蒋介石缺乏明确的、坚定的抗战态度和周密细致的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目标战略部署。因此，在战争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军队不抵抗或软弱的抵抗或不战而退。观察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东北战场的战争，中方采取的战略、策略和战术，必须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即“敌强我弱”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虽然我们不应该轻易地给蒋介石戴上“不抵抗主义”的帽子，可是缺乏战争准备和未组织有计划有成效的战略撤退或转移，应当受到批评和谴责。战争初期，反蒋的群众运动、谴责蒋介石的呼声不断涌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蒋介石软弱的抗日政策的反弹。

总之，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甚至加上“主义”的帽子，应当从中国面临的国情和中日军事经济力量对比而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应一棍子打死。战争中期之后，蒋介石逐步转向积极的抗战态度，从多个方面积极备战、迎战。

第二，关于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

我们认为，侵略和反侵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中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从中国人民积极组织抵抗的角度研究多，出版的著述也多，研究队伍也较庞大。然而，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侵华罪行，揭露与研究甚少。事实上，日军随着战争的进展，不仅给中国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而且犯下了种种残暴罪行，诸如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和化学战，虐杀战俘和强掳劳工，对中国许多大中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在南京实施极端残暴的大屠杀，在华北等地实行“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对中国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财富进行掠夺和破坏，在广大的日军占领区实行严密的社会控制，等等。

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十分猖獗，不断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否认侵华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在这种形势下，加强日本侵华罪行历史的研究，揭露

其真实面貌，显得日益紧迫。然而，我们的研究工作远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其中有些罪行史的研究，史料匮乏，研究力量十分薄弱，有关部门应该引起关注。日本罪行历史的研究，以南京大屠杀为例，二十年前国内只出版了约200万字的史料，远不能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南京地区组织了约100余人的研究团队、翻译人员，花了十年时间，远赴8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搜集史料，掌握了英、日、法、德、俄、意、西班牙及中文约5000万字的原始文献，翻译、整理出版了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尽管日本右翼不断抵赖，这4000万字的铁一般的证据是无法否认的。

第三，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影响的研究。

多年来，我们十分重视抗日军事史的研究，但是，对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后果，关注不够。事实上，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导致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严重挫折，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譬如：

日本侵华造成了中国社会人口的巨大变化。其一是大规模战争、遍及各地的自然灾害和不断爆发的各种严重瘟疫，造成中国人口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其二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人口的自然流动是正常现象，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却造成中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常的被动迁徙。当时有短距离的从城市向乡村或山区流动，这种情况多属暂时的逃亡或投亲靠友。可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广大沿海地区各省人口向内地尤其是西南地区大规模流动，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带来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大量掠夺中国的经济财富和文化财产，使中国经济蒙受严重损失和破坏。许多沿海地区的工厂企业，被迫迁往西南、西北地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勉强维持生产。战争也打乱了教育事业正常的教学秩序。华北、华东地区众多的大学、中等学校和文化事业机关，被迫迁往西南、西北地区的城市甚至边远农村，在简陋的校舍环境中，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中国的大好河山，在日军的铁蹄下，被踏得支离破碎，形成了大后方、沦陷

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海孤岛以及日据台湾等。在日占地区，日本侵略者实施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统治政策。人民的生活无法安居乐业，各种灾难不断降临，广大的中国民众生活在极度的不安和恐慌之中。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日本侵华导致中国人民思想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其中，大多数人，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保卫祖国，奋不顾身，直至献出生命，为国捐躯，表现了高尚的爱国精神。也有的人，面临强敌，为保存自己，不惜卖国求荣，充当了汉奸；也有的人，大敌当前，不惜采取软弱逃避的态度，置国家与民族危难于不顾；有的人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感到无能为力，采取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态度。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许多人在努力支援抗日战争，为保卫国家民族作贡献。但是也有人生活依旧，早上进茶馆，晚上入澡堂。有人形容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形形色色的不良思想，侵蚀着中国人民，影响着优秀的中华文明。

日本侵华带来的中国社会大变动，虽然也促进了中国的民族大团结，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境地。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危害。

张宪文

一、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20 世纪初，日本作为世界东方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列强争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企图独占中国利益，排斥英美等国在华势力。20 世纪 20 年代，田中义一内阁提出了新的“大陆政策”。这一政策的主旨，不仅要独占在华利益，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而且要并吞整个中国，消灭中华民族。1931 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的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和对中国内地的大规模入侵，无不是日本企图实现这一阴谋的具体步骤。

日本的军事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生存，陷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绝境。挽救民族的危亡，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海外侨胞，都必须以民族大义为重，把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反侵略大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局，也是检验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个中国人是否忠诚于祖国